

放生「黑金」搞手 反對派公信盡失

龔信之 資深評論員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昨日裁定，工黨李卓人和社民連梁國雄未有申報收受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捐款的投訴不成立。這個決定令外界嘩然，原因是李卓人將捐款「袋住先」、梁國雄將捐款「自己袋」，兩人違規收取捐款已是證據確鑿，如果這樣明目張膽的違規都可以接受，立法會還有何規矩可言？《議事規則》豈不淪為一紙空文？投訴不成立，兩人可以避免譴責，這是對公義的損害，也是對立法會聲譽的損害。反對派議員在委員會上偏私包庇，認為兩人收取黑金行為沒有問題，暴露反對派的虛偽和雙重標準。確實，不少反對派中人自己也有收取黑金，又怎可能會支持追究有關行為呢？看來，還是要由廉署介入調查，才有望追查真相，單靠反對派自己查自己，只是一廂情願。

李卓人和梁國雄的黑金案，情節其實並不複雜。較早前李卓人被傳媒揭發先後收取黎智英150萬元，雖然他事後聲稱是代工黨收取，但其後又自爆曾將其中50萬元捐款「袋住先」長達大半年，直至醜聞曝光後才急急歸還該黨。社民連梁國雄被指收受了100萬元，就此他辯稱只代所屬政黨收取黎智英50萬元，另外50萬元一直不知所終。顯然，他們都是秘密收取黎智英的黑金，並沒有向自身的政黨申報，也沒有向立法會申報，這些行為已是名副其實的違規。至於他們辯稱代黨收取捐款，更加沒有說服力，如果是代黨收取又何必如此鬼祟？

「中飽私囊」違規不容狡辯

《議事規則》列明，若議員一年內從單一來源收受總數超過議員年薪百分之五的利益，或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1萬元實利，須於14天內申報；若有議員違規，可由立法會藉訓誡或譴責，或暫停職務或權利的議案加以處分。李卓人、梁國雄收取黎智英捐款，已經超過限額，而他們卻沒有申報，令人懷疑他們是有意「中飽私囊」，及至被傳媒揭發後，才急急「補鑊」交回其政黨，更是作賊心虛。其中，李卓人隔了一段頗長時間才將款項交回工黨，但當中的利息或投資收入，恐怕已被

他「袋袋平安」了，這樣都不算違規，立法會當市民都是傻瓜嗎？至於他們所屬的政黨中人為兩人辯解，其實也是不足為奇。李卓人是工黨真話事人，梁國雄是社民連唯一大佬，就算他們真的是「落格」，黨員也不敢置喙，所以其證供是否可信本身已令人質疑，更不應以此作為兩人脫罪的證據。況且，其實社民連也沒有梁國雄轉交捐款的記錄，請問他還有何反駁之理？

與黎智英涉及重大利益衝突

立法會在議員收取利益上有嚴格的限制，原因是議員領取的是公帑，而他們有份審議的政策法案，又直接關係社會利益，所以必須確保議員能夠在中立、不偏不倚的情況下議事。因此，任何議員收取捐款必須向立法會申報，開誠佈公，而在討論涉及到與自身有關的議題時，也要離座避席，就是為了保障公眾利益。現在，李卓人、梁國雄以至一眾反對派議員，多年來都收取黎智英單一金主的大筆捐款，如果他們不作申報，試問市民又如何知道他們與黎智英的利益關係？如果不是有傳媒揭發，李卓人、梁國雄相信還可以在立法會上繼續為黎智英服務，難道這又符合公眾利益？因此，兩人這次沒有申報利益，並非小事，不但違規，更令人懷疑當中涉及大量的利益衝突，兩人犯下如此明顯的錯誤，而立法會竟然不作譴責，這樣的決定實在令人失望，也令立法

會的聲譽雪上加霜。

雙重標準 偏私包庇

至於反對派議員一向要官員「比白紙更白」、道德標準定得極高，但現在涉事的是反對派議員，他們的標準立即可以一百八十度轉變，認為兩人只是一時疏忽，這樣的雙重標準令人嘖嘖稱奇，也暴露了反對派的虛偽。但這也難怪，因為不少反對派議員都有收取黎智英黑金，相信當中更可能涉及違規行為，如果這次重罰兩人，「他朝君體也相同」，反對派自然要輕輕放下。放生兩人，其實就是放生自己，這也是反對派投下反對票的原因。現在看來，要靠立法會主持公道，追究黑金事件已屬妄想，原因是監察委員會要保持所謂平衡，建制派與反對派人數相同，而在反對派偏私包庇之下，任何調查都是枉然，只是白白浪費時間金錢，釋除了不了外界疑慮之餘，反增加外界對立法會議員操守的疑慮。「黑金」捐款涉事議員，涉嫌違反《選舉條例》、觸犯《議事規則》的《個人利益登記指引》、《防止賄賂條例》，以及偷稅漏稅等。既然如此，理應由廉署介入調查，循刑事方向追究，才可望還港人一個公道，並維護本港廉潔。一日不斬斷「黑金」鏈條，反對派議員的服務對象就永遠不是市民，而是在黑暗中用金錢餵養着反對派的幕後黑手。

「身份衝突論」鼓吹隱性「港獨」

彭靖雅

由學民思潮發言人黃子悅所寫的《新一代香港人的身份衝突》，以「港中矛盾越發激烈」為基調，將「香港」和「中國」區分開來，強調香港人有所謂的「身份衝突」，嘗試以「地方身份認同」來抗衡「國民身份」，進一步鼓吹分離主義。

此文透視出「政治隱疾」——隱性「港獨」。社會上有些人無時無刻都在想盡法子，反對每一項可能促進兩地融合的政策，炮製對抗性的話題，強行區分「中國與香港」。文章更提到：「從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最高、對中國最缺乏感情的青少年入手，推行國民教育，但結果又適得其反。」文章作者盡力否定國民教育，更呼籲要「以爭取民主、自決香港前途來建立香港主體性」。

《新》文的立論非常偏頗，一方面說要思考「身份」的問題，一方面又非常主觀而單一將問題與責任歸咎於特區政府和中央，拒絕了解中國與香港的歷史發展。在思考問題時最基礎的資料缺位，又如何理性批判？這樣的「分析」極具誤導性與矇騙性。就如文中提到的「將所有反對、不滿中國的人，歸為港獨分子；主張香港人、本土的，即使沒有否認中國人身份或中國對香港的重要性，也會被歸為提倡港獨」根本並非事實，這種說法極可能只是作者個人的「異想天開」，而作者片面地將所有問題單一串聯，自行歸納，企圖藉此鼓吹隱性「港獨」。

《新》文說「要避免單純的排他、仇恨政治」，然而又將重點放在了這一句「以爭取民主、自決香港前途來建立香港主體性，也是年輕一代要思考的問題」。全文顯示對正常的國家觀念非常抗拒。這種無國家的「地方身份認同」，與殖民主義不謀而合。香港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是港英殖民政府從教育制度已開始有意為之的事實。有學者曾就港英殖民時代的社會政治作出分析，指出在殖民時代，香港的教育及主流媒體對灌輸中國人歸屬感扮演了負面的角色，「當時教育制度方面，最大的特色是去政治化」。港英政府這種「去政治化」也就是「去國民身份化」，刻意經營一種「無國家」、「無國民」的社會價值觀，同時強調香港人的經濟身份，為「地方身份認同」建立了基礎，無視了人民與國家的緊密性。

西方國家一向積極推動國民教育，為國民以及青年人樹立正確的國家觀念。所謂的國民身份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個人認同自己是某個國家的國民，對國家擁有情感和歸屬感。國民身份認同可透過推行國民教育，令國民從認識祖國文化、語言和歷史等，提高身份認同感，有利於國家推行政策，達至人民團結及社會和諧的目標。

中央從來沒有輕視或貶低香港人身份，《新》文的說法根本無視實際問題之所在。由反對勢力策動的「真普選」、「公民提名」等偽命題，都是撈取政治資本的鬧劇；由激進組織催生的「鳩鳴」、「反水貨客」等暴力行為，更嚴重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破壞兩地和諧。香港的青年人對政治議題日漸具有興奮性、敏感性，然而，要獨立思考，理性探索，一定要有足夠的認知與判斷力，不要被一些「意見領袖」政治化的誤導而人云亦云、誤入歧途。

較早前，房委會宣佈全港公共房屋的停車場加租。加幅雖然並不大，但卻向社會傳遞出帶頭加價的立場和訊息。大部分公屋住戶，不是富裕階層，要使用月租停車場泊位更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當中，大部分是住戶的「搵食車」，停車場一旦加租，無疑令他們的經濟負擔更趨沉重，基層市民生活變得百上加斤。

香港經濟水道依然嚴峻，不少指標都警示香港市民需做好經濟下調的準備。基層市民的實質工資，不僅沒有明顯的增幅，還要應付高通脹帶來的生活壓力。公共房屋是政府對市民的重要經濟支援，目的在於紓緩市民的經濟壓力，讓市民能積累財富，然後騰出公屋，幫助公屋流轉。公屋停車場基本上只有該屋邨居民才可租用，已進行了相關的資產及入息審查。房委會帶頭加租，既沒有體諒基層市民的經濟承擔能力，更為市場帶來了加租的訊息，從而令停車場租金水平上調。

政府應帶頭展示出社會責任，為香港市民帶來應有的支援，令居民可以安居樂業。況且，公屋邨停車場的政策一貫是令人摸不着頭腦的。當一個停車場的使用率較高時，政府會由固定車位制轉為浮動車位制，但同時其租金便會下調。但當租金下調時，便會吸引更多使用者租用車位，令使用率再次被推高。相反，當一個停車場的使用率較低時，政府會由浮動車位制轉為固定車位制，但同時其租金便會上調。但當租金上調時，使用者減少租用車位，令使用率再次被減低。這是最簡單的經濟理論，但政府卻一直執行違背經濟理論的古怪政策。

筆者認為政府應同時推出固定及浮動車位制，以配合不同需求的使用者。同時，可以取長補短，平衡兩種制度的優劣。一個小小的停車場租金政策，卻影響了香港很多基層家庭，再次證明政策與民生工作是一體的。

杜葉錫恩是香港青年做人做事的楷模

龔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合創會主席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懷念杜葉錫恩情繫香江65載暨全港青少年進步頒獎典禮」上的致辭，精闢而滿懷深情地詮釋了杜葉錫恩一生行善的大愛厚德，她的民主精神、大愛情懷、公義追求，已經融入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成為香港歷史的輝煌部分。杜葉錫恩無疑是香港青年做人、做事的楷模，香港青年的健康成長和成才，就是對這位老人在天之靈的最好告慰。

張曉明主任出席「懷念杜葉錫恩情繫香江65載暨全港青少年進步頒獎典禮」活動時，寫下了「仁者壽」的條幅。張曉明表示：「我對這位老人家的敬重，不僅僅蘊含了作為晚輩對長者應有的尊敬，更因為她的身世、品德、風骨不同凡響，而增添了『仰之彌高』的感覺。」張曉明對這位老人家的敬重，啟示了尊重美德是做人根本的道理。

美德是人類心靈與共的東西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在一切道德品質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我們應該盡量使孩子們開始聽到的一些故事必定是有道德影響的最好一課。」杜葉錫恩的故事，就是對香港青年的最好一課。正如張曉明所說，杜葉錫恩的故事「再次使我們確信，美德是超越了種族、膚色、信仰的，它是人類心靈與共的東西，閃耀着人性的光輝，譬如浩瀚夜空裡的星辰，越是幽暗，越是透射其光亮」。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一個人如能在心中充滿對人類的博愛，行為遵循崇高的道德律，永遠圍繞着真理的樞軸而轉動，那麼這個人雖在人間也就等於生活在天堂中了。」杜葉錫恩就是這樣一個人，她的善行大愛，贏得了「香港良心」、「民主之母」、「冤情大使」、「教育先驅」等眾多美譽。

杜葉錫恩追求的公義具永恆價值

杜葉錫恩終其一生追求公義，正直不阿。從抵達香港的第一天起，她就為種種社會不平等、不正義現象鳴不平。為了幫助華人社會那些最底層的市民，以及那些被欺凌的弱勢群

體，她挺身而出，向殖民政府討回公道。眾所周知，殖民統治時期街邊小販不給警員和「販管隊」賄款，就會被拳打腳踢、充公貨物、罰款坐牢；山邊寮屋或舊樓發生火警，消防到來，「有水（錢）有水、沒水（錢）沒水」，普羅大眾求助無門。杜葉錫恩經常在報章撰文大膽地揭發體制內猖獗的貪污現象，更利用出任市政局、立法局議員的機會指出滋生貪污腐敗的根源，她還直接到英國游說國會議員批准成立廉政公署，打擊香港貪污行為，為香港日後的廉政制度立下汗馬功勞。

杜葉錫恩堅守「活着就要為窮人說話」的座右銘，絕不為各種壓力和利誘「收聲」。上世紀50年代，香港教育未能普及，基層人士缺乏接受教育的機會，杜葉錫恩針對社會需要，創立慕光英文書院，向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援助。當時她的學校只是租用大廈兩層樓作課室，亟盼能夠得到地皮興建校舍。港英政府託人轉告，只要她「收聲」，地皮和校舍都可以送上，但葉錫恩拒絕了。她寧願自籌經費勤儉辦學，也不肯以窮人利益為籌碼去作政治交易。她所追求的公義是真公義，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具有永恆的價值。

包容民主理念 推動本港民主進步

杜葉錫恩是香港民主的先驅，她是在殖民統治時代公開站出來抨擊殖民統治的人，是在民意尚未受尊重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願意傾聽市民意見的人，是最早呼籲推動民主政制的人。對於這位堅定不移抗衡殖民獨裁統治的英國人，本地政壇不分左右皆致以崇高敬意。現今香港政壇的許多資深人士，都承認是受杜

葉錫恩感召投身選舉為社會服務。

杜葉錫恩的民主精神是可以包容不同聲音和意見的。她批評「那些自稱為『民主派』的人其實一點也不民主」，直斥某些人「實際上是以其不民主的行動，延緩我們的民主進步」。她歷久常新的民主理念，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醒世良言，對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看看如今是非混淆的政壇，誓不妥協的死硬派愈來愈多，可以包容不同聲音和意見的溫和派愈來愈少，令人深思杜葉錫恩包容民主的價值。

杜葉錫恩對民主、真理和正義的執着追求，也體現在她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從未含糊的立場選擇。她支持香港回歸中國，與「末代港督」大唱反調，被標籤為「親中勢力」。她贊成基本法23條立法，反對非法「佔中」。她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評價客觀公允。

牢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道理

習近平主席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的講話中指出：「廣大青年要把正確的道德認知、自覺的道德養成、積極的道德實踐緊密結合起來……要牢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道理，始終保持積極的人生態度、良好的道德品質、健康的生活情趣。」杜葉錫恩其人生軌跡，正正詮釋了何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道理，是香港青年做人做事的楷模。

前輩先賢的事跡，正是青少年端正自身的一面鏡子。張曉明主任在頒獎禮上，對在座的60位獲得「2015全港青少年進步獎」的同學表示：「杜葉錫恩女士無疑是我們做人、做事的楷模，你們的健康成長和成才，就是對這位老人在天之靈的最好告慰。」



龔子明

北約怨土耳其戳破「馬蜂窩」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土耳其自擊落俄羅斯戰機後，知道非同小可，立即要求北約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付莫斯科的可能報復。根據北約機制，只要有成員國受到軍事威脅或入侵，北約有責任協同作戰、致力解救。土耳其以為能夠得到北約的大力支持和庇護，但最後卻大失所望。大多數北約成員國埋怨土耳其為什麼不採取驅趕、抗議和警告等溫和行動，而一下子捅了個「馬蜂窩」。多國國防部長質問土耳其擊落軍機的背後意圖。北約清楚，普京因為油價大跌正大為惱火，懷疑是北約搞的鬼；北約更不想因此與俄捲入戰爭。

因為烏克蘭事件，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美國毫髮無損，歐盟和莫斯科都出現困局。普京介入打擊IS戰役後，勢如破竹並很快取代美國成為中東局勢的主導。土耳其這個時候從背後捅一刀，美國在第一時間聲明「事件與美國無關」。歐洲國家擔心莫斯科的全方位報復波及歐洲，已視土耳其為「麻煩製造者」。北約秘書長為了面子，自欺欺人地說，正討論向土耳其提供支持，但與擊落俄戰機無關，顯示北約對土國擊落戰機一事有所忌憚。

拒答應土國「要脅性」要求

根據北約的機制，任何成員國如果受到安全威脅，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向北約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商討事態、尋求保護、制定對策。北約成立以來，曾經召開過5次這樣的會議，其中3次由土耳其提出，連同這次「戰機」事件，土耳其已經是第四次使用這種機制。在這次緊急會議中，美國雖然開出「空頭支票」，支持土耳其捍衛領空的行動，但更多北約成員國認為，土耳其的行動「草率」、「魯莽」，擔憂土耳其其將「引發災禍」。英國直指土耳其已經「製造了嚴重事件」；捷克猛批「行動冒進」。

土耳其面對俄羅斯制裁、邊境增兵、部署武器等壓力，希望得到北約的保護；要求北約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俄羅斯，對普京政府採取強硬立場。出於心虛，土耳其甚至要求北約對其安全作出更加明確的「再保證」。由於俄軍行動是「反恐」，出師有名；土耳其在電視上提供警告俄戰機越境的錄音是「假貨」的可能性極大；多種證據又表明土耳其確實是IS的最主要「原油客戶」。這使大多數北約成員國不願為土耳其站隊，甚至認為土耳其企圖「綁架」

北約，拒絕回應土國的「要脅性」要求。

俄羅斯佔據輿論制高點

「戰機」事件已經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即使是土耳其的堅定支持者美國，在為土耳其打氣的同時，也不忘加上「與美國無關」、「希望通過協商降溫」等說詞。歐洲國家普遍指責土耳其行動「不智」；北約不僅對土耳其原「要脅性」要求不予理睬，多國國防部長更直指土國在「搞事」。土耳其總統開始以為有北約撐腰，態度強硬，甚至稱莫斯科應該向土耳其道歉，隨着俄羅斯加大制裁和北約態度明朗化，土國的態度已明顯軟化。

法國受到恐怖襲擊後，立即加大对IS的打擊力度，更多次公開表示，反恐離不開和俄羅斯進行更加緊密的合作。美國在進行一輪孤立莫斯科的行動後，意識到和俄羅斯對着幹無助解決IS，於是派出國務卿克里到俄羅斯和普京會談，顯示態度已經轉向。無論土耳其發出「要求和普京見面、願意和俄羅斯對話」的聲音，並不斷釋放願意緩和緊張關係的訊號，都沒有得到莫斯科的回應。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認為，在「戰機」事件中，俄羅斯得到更多同情分，土國則明顯處於「下風」。

房屋署停車場帶頭加租漠視民生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觀塘區議員